

从玄奘与哲罗姆的比较看中西翻译思想之差异*

陈琳 张春柏

(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玄奘和哲罗姆所处的历史阶段相近、宗教翻译地位相似,但各自的翻译思想却不同。玄奘的翻译策略具有重写的特征,主要受佛教意识形态和初唐时代诗学影响。哲罗姆明确指出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对应关系,其翻译策略主要是翻译方法上的直译意译二元论。本文认为,二者差异反映出中西翻译思想的不同特点,这些特点沿袭至今,即:中国翻译思想重写意识浓厚,而西方翻译思想文本种类与翻译方法的关系意识强烈。

关键词:玄奘;哲罗姆;翻译思想;重写;文本种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06)01-0061-05

1. 引言

在中西译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玄奘(600-664)和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是在相近的历史时期分别出现在中西古代翻译史上的最著名的宗教权威、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以下四方面很相似。

首先,两人的语言背景相似:精通原语和目的语。玄奘为追求佛经真义,于629年,独自踏上西征天竺(印度),探求佛本法源的漫漫长途。西行十七年之久,求法于当地最高学府那烂陀寺,这种经历使他精通梵汉双语。哲罗姆出生于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基督教家庭。他在罗马接受了一流的语法和修辞学教育,熟谙拉丁古典作品。在二十多岁时,学习希腊古典作品。三十二岁开始,又刻苦学习了希伯来语,其水平超过了当时教堂里唯一懂得希伯来语的几位神甫,被视为精通三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神职权威。

第二,两人的宗教和宗教翻译地位相当。玄奘是唐朝最具权威的佛学家,并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他在645年至664年的十九年间,共译出经论达75部,1335卷,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卷。哲罗姆是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四大传统翻译理论家之一,并于八世纪被罗马教会封圣。在由国际译联翻译史委员会主席让·德利尔(Jean Delisle)博士等主编的《历史上的翻译家》一书中,玄奘是中国翻译家中着墨最多的一位,著者认为“他的翻译使佛教在中国得以普及”,而哲罗姆则被称为“西方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Delisle 1995:105),他的译本《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圣经》标准的拉丁文本。

第三,两人翻译目的相同,都是对照经书的原文进行

翻译以使经文的译本能更准确地传达佛或上帝的真实意图。玄奘的原语文本是 他从印度取经取回的梵文本。哲罗姆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位直接从《圣经》的希伯来原文进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对《旧拉丁圣经》的《旧约》进行了彻底的修改。

第四,两人的翻译赞助人都是处于最高地位的皇帝或教皇,而且翻译结果都被钦定经典化。玄奘于645年1月携带梵文佛经657部返抵长安,唐太宗亲自召见并留其在长安弘福寺等寺院译经。他在译经的十九年中,就译经之事先后上太宗和高宗的表、启共35件,并编辑成书,题为《沙门玄奘上表记》。他每译完一部经卷就上奏。例如,玄奘译完《金刚经》后,“直接呈奉太宗,太宗立即将新译本发布全国。”(李利安 1995:298) 哲罗姆是罗马教皇达马泽斯一世的秘书、口译员和神学顾问,备受教皇的恩宠和信赖。383年,教皇指定哲罗姆对几种现存的《圣经》拉丁译本进行修订,编译出一套系统的、独立的拉丁文圣经。哲罗姆翻译的动力最初来自至高无上的教皇的压力。哲罗姆译经十四年(390-404),产生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并在1546年宣布为教堂认可的版本。

虽然玄奘和哲罗姆的宗教翻译地位很相似,但他们各自的翻译思想却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一不同带来了中西翻译思想发展的不同。玄奘的翻译策略是重写,主要是受其佛教宗教意识形态和初唐时代诗学影响。哲罗姆的翻译策略是翻译方法二元论,对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对应关系有明确的认识。下面首先分析玄奘翻译的重写特点及其原因,并简要介绍哲罗姆的二元论翻译思想,然后从历时角度比较中西翻译思想在这方面的

*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方译学比较研究》[2002BYY002]成果之一。

发展差异。

2. 玄奘的翻译重写特征及其原因

翻译文化学派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视翻译为“重写”。重写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文本形成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他认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即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所谓意识形态,勒菲弗尔给了一个简明的解释,即:当时的主导观念认为社会该怎样。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的有关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Lefevre 1992:5)。所谓诗学,即当时的观念认为文学应该怎样,包括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以及观念,或者说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ibid.:26)。我们可以从翻译文化学派的重写论角度重新认识玄奘的翻译思想,并通过与哲罗姆的翻译思想对照,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与西方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的差异。

玄奘翻译重写的原因之一是受其所处时代——初唐的佛教意识形态以及他本人的佛教意识形态的影响。初唐翻译佛经的主导观念是唐太宗和唐高宗对佛教的极大兴趣以及他们利用佛教安抚民众的意识。任继愈指出:“唐代佛教,既摄南朝佛教讲说的学风,从哲理方面阐扬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也保留了北朝佛教注重禅定的学风,从宗教方面把人民纳入奴化教育的封建规范之内。”(任继愈 1994:329)玄奘研究专家马佩论述了玄奘的佛教流派及其在翻译中的体现:

在译介天竺后期佛教“大乘有宗”时,创立风靡全国的佛教“法相宗”学说。因该学说以论证“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故又称为“唯识宗”。瑜伽大师世亲晚年曾著《唯识三十说》,蕴含了瑜伽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在他之后,护法等瑜伽后学争相对《唯识三十说》加以阐释诠释。公元659年,在弟子窥基的建议和协助下,玄奘杂糅十家学说,贯通诸家思想,译出《成唯识论》10卷。译本已不同于梵本,它渗透了玄奘唯识思想的因素,是一部带有明显玄奘思想倾向的“译著”。(马佩 1997:127)

因此,玄奘本人对佛教教义的阐释与理解,形成了他自己认为最忠实于梵文教义的宗教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对他的翻译过程的描述得到进一步说明:“今所翻转,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释道宣 1926:1123)也就是说,他在译经过程中展示了他作为佛教大师译者的意识形态。马佩的“译著”这个词和“都由奘旨,意思独断”与勒菲弗尔的视翻译为“重写”有着非常一致的内涵,即根

据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对原文再“著”,以译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玄奘的翻译是他对佛经的理解的表达,是对佛教义理的“唐文写作”。

佛教学者李利安认为玄奘译本表现了他对佛教义理阐释的特点:“玄奘的译本在论述如来法性时显得更加详细,更为完整。在《金刚经》中,除了谈到观悟如来法的原则与方法之外,直接阐释如来法性的主要有两处,这两处在玄奘本中均比其他译本全面丰富。”(李利安 1995:312)单从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出,玄奘将他自己的思想意识加进了译本。以下四个例子能具体地说明这一点。

(1)罗什译本:

如来者,即诸法如义。

玄奘译本:

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无生法性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永断道路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毕竟不生增语。何以故?善现,若实无生即最胜义。

根据以上这两个译本,李利安认为玄奘“将本体论与解脱论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强烈的宗教修道色彩,这比其它译本(当然包括罗什)仅从真如本体一个角度解释全面得多。”他还补充道,“真谛和义净的译本均与罗什译本意义相同。”(ibid.)由此可见玄奘的重写。又如,在涉及观悟如来的方法时,玄奘详尽地补充了如何观如来。

(2)玄奘译本: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

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善现,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是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如是应以诸相、非相观于如来。”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

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

罗什译本: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李利安认为,在这段文字中,“对于文中提出的怎样才能悟到如来佛,罗什本没有明确答复(中亚梵本亦无下面四句)。而玄奘译本在此之后却多了四句,明确指出

‘应观佛法性’，而佛的‘法性’也就是佛的‘法身’。如果说前四句是讲如来之‘相’的，后四句则讲如来之‘性’。通过对‘相’的真实性的否定，说明佛相不同于佛性。前者是可以认识的，而后者，则如玄奘所言；‘法性非所识，姑彼不能了。’它是一般认识所不能及的。”(ibid. : 316)因此玄奘在译本中添加了如来法性、法身的理论。

(3) 玄奘译本：

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

罗什译本：

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玄奘译本对‘金刚般若波罗蜜’之法的阐释更为成熟老练”（任继愈 1994）。其实，这种阐释就是玄奘佛教义理的展示。下面这个例子也说明这一点。

(4) 罗什译本：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次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

玄奘译本：

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谓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故名最胜波罗蜜多。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最胜波罗蜜多。

玄奘的译本对般若波罗蜜之所以是“最胜波罗蜜多”做了说明，即因为它是无量无数个佛所一致推崇、一致宣说的佛法。

从以上四个译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第一个例子中玄奘的多角度解释，第二个例子中玄奘在译本中添加了如来法性、法身的理论，还是第三个例子中周到圆满的解释和第四个例子中的补充说明，都是玄奘根据他个人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在他本人作为译者的意识形态操纵下，对原语文本的重写。正如李利安所言，“玄奘译本的这些（指义理——本文作者注）不同，首先是与其渐悟观相一致的，其次与其严谨的成佛理论是相同的。”(ibid. : 311)。玄奘的翻译是他佛理思想的表现方式，他的这种重写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造成他的译本篇幅最长的主要原因（玄奘的译本为 9500 多字，罗什的译本 5000 多字）。所以说，初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他本人作为佛教大师的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了他对梵语文本进行重写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诗学。玄奘研究的印度学者柏乐天指出，玄奘用了六种翻译技巧，以使原文符合初唐文体（马祖毅 1999 : 151 - 152）。玄奘提出的翻译标准是“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求真，指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内容；求俗，指译文语言必须符合当下的诗学规范。那么，当时的

诗学规范或“俗”是什么呢？翻译界一直称玄奘“弃骈取散，以朴素的通俗文体真实传达出佛经的内容和风格，大大影响了唐代文体的改革。”（王秉钦 2004 : 15）这就是说，当时诗学规范中的文体或玄奘所说的“俗”是散文体而非骈文。其实，通过对玄奘译本文体和他所处时代即初唐盛行文体的进一步考证，实际情况是他并没有弃骈取散。

首先来看初唐时代的诗学特征。在唐朝，朝中命官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根据《旧唐书·职官志》，考进士要考律赋、五言律诗，吏部选人要考判，都用骈体，“吏部择人以四才，谓身、言、书、判。”（刘煦 1975 : 2699）欧阳修《新唐书·文艺传序》首段指出：“朝廷诏令、臣僚奏议等也使用骈体……初唐四杰的文章，则是当时骈俪文风的代表……唐代文章发展，经历三次变化。第一变在初唐，是华美的骈文，注意辞藻声韵，沿袭南朝文风，声律更趋严密，以王勃、杨炯为代表。第二变在玄宗朝，仍然是骈文，但是风格有所改变，改变了过去骈文浮华的习尚，文风趋向雅正，以张说等为代表。第三变在中唐，是古文，文章贯通儒学，法度森严，上追周汉，达到极盛，以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为代表。整个唐五代时期，骈文却一直占据着优势。”（转引自王运熙 2002 : 388）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玄奘所处的初唐时代的诗学特征依然是骈文。释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评述也说明玄奘遵循当时的规范：“但为西梵所重，贵于文句，钩锁联类，重沓布在，唐文颇居繁复，故使坠工专司此位，所以贯通词义加节度之。”（释道宣 1926 : 1540）所谓“唐文颇居繁复”，应是指骈文的繁复句式。骈文有严格和宽松两类。严格的不仅重对偶，而且讲究声律，要求平仄调谐，上下粘附，其格律实际与律赋、律诗相同，大抵运用四言、六言句，后来就称为四六文。宽松的骈文，虽大量运用骈句，也重视音调流美，但不严格要求平仄调谐、上下粘附，骈文偶句运用不多，但句式比较整齐，少用虚字，其通篇体式气格，仍属骈文一路，许多叙事文以及史书中的叙事部分因为不宜多用骈句，往往属于此体。这后一类宽松的骈文，数量最多。唐五代骈文的语言，多数趋向明白晓畅，有的甚至流于通俗化。我们从以下玄奘译本分析来看，他的文体可以看作是宽松的骈体。在这一点上，李利安也持同样的看法：“玄奘译文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盛行的骈文文体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仄形式出现，其中最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为了凑成句式上的这种对称，保持骈文文体的节奏，玄奘在翻译过程中费尽了苦心，甚至做了一些增益。”（李利安 1995 : 300）他给出了下面这个例子。

(5) 玄奘译本

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少法是如来、应、正等觉所说。何以故？世尊，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所说、所思惟

法,皆不可取,不可宣说、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诸贤圣补特伽罗皆是无为之所显故。

他分析说:“句中的‘所思惟’、‘应正等觉’两词在其他译本中皆无,查某些梵汉对勘本,发现诸梵本中也是没有的。‘应’即‘应供’,佛十号之一,意即无所不知的圣智。可见,‘应正等觉’与‘如来’所指是完全一样的。加上它们完全是为了凑成四四拍对称的格式,即形成;‘世尊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所说,所思惟法,皆不可取,不可宣说’这样的骈体文。类似的例子在玄奘译本中处处皆是。”(ibid.:301)

我们再从文体的角度再次分析上文引用的《金刚经》的四个片段。在例(1)中,前三个分句和例(2)后部分的偈颂是工整的骈文体,而例(2)的偈颂前一部分、例(3)和例(4),虽不是骈体,但句式整齐,行文精严凝重。因此,玄奘译本可视为宽松的骈体。正如吕澄所说:“他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变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吕澄 1953)可见他的译本的声韵具有骈文的色彩。

为了保证他的译本符合当时的诗学要求,一方面,他在译场中专门设置了“缀文”和“润文”职司。所谓缀文,即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润文则是从修辞角度对译文加以润饰。另一方面,他还曾经请求唐高宗专门派朝中显贵参与,唐高宗下诏:“慈恩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有不稳妥,随事润色。”(释道宣 1926:1560)而这些朝中命官的文风如前所述,是骈文体。

总之,玄奘并没有放弃骈文,而是受当时诗学影响,将梵文文本译成一种宽松的骈文体,这构成他重写的文体特征。

3. 哲罗姆的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的关系

哲罗姆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的对应关系的翻译家,他并且将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的翻译策略作了明确的区分。公元 395 年,在他的《致帕马丘书》(De Optimo Genere Interpretandi)中,他宣称:因为《圣经》中连词序都是有一定意义的,所以除了《圣经》翻译以外,在做希腊文-拉丁文翻译时,他的翻译不是逐词翻译(word-for-word)而是以义释义翻译(sense-for-sense)。他的逐词翻译和以义释义翻译即直译和意译。也就是说,他的《圣经》翻译采用直译而文学翻译采用意译。这段话有三个意义。第一,为直译找到定义:对《圣经》原文的句法结构不得有半点改动,否则就会损害《圣经》的“神圣含义”。其结果是,他的译本高度忠实于原希伯来语文本,加之其译本的学者风格,使得它胜其它译本。(Metzger 2002:35)第二,为意译找到定义:翻译不能字比句次,而必须采取灵活的方法,对作品加以适当更改,译者可以掺入自己的性格色调,使译作像原作一样

优美。实际上,他强调的是译文的风格。第三,他成为西方翻译理论中讨论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的关系的始作俑者。

4. 中西翻译思想发展的不同轨迹

在西方翻译思想的发展上,有关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之间关系的讨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再次兴起并进一步具体和明确化(陈琳 2004)。

70 年代,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理论家凯瑟琳娜·莱斯(Reiss 1977:105)根据布勒-雅可布逊(K. Bühler-R. Jakobson)的语言三大功能学说,将文本种类分为表达性文本、信息性文本和呼唤性(施为)文本,并建立起它们与翻译策略的对应关系。她认为,原文的文本种类决定翻译策略。表达性语篇的译文应该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美和艺术美,采用“识别”翻译法,目的在于使译文读者能领悟到原文作者的观点和语言表达特色。信息性语篇的功能是传达信息,翻译应采用直白的陈述,清晰而充分地再现原文所指和概念内容。施为性语篇的翻译应注重译文接受者的反应,翻译应采取“改编”法,将译文改编成在目的语中具有同等交际功能的对等体,以唤起译文读者实施同样的行为。

80 年代初,英国形式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Newmark 1981:45-49)也采用了文本功能分类,并使它与翻译策略的对应关系更为具体、详细。纽马克的翻译策略主要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他认为,通常而论,表达语篇采用语义翻译,信息语篇和呼唤语篇采用交际翻译。纽马克认为,布勒-雅可布逊提出的另外三个语言功能即寒暄功能、审美功能、元语言功能也应该与翻译策略对应:寒暄功能语篇采用交际翻译,即改编成在目的语中具有同等寒暄功能的惯用语;审美功能语篇的翻译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特别是原文中的原创性隐喻;元语言功能语篇的翻译采用解释、举例、文化中性等翻译技巧。但他同时指出,一个语篇不太可能孤立地使用一种策略,常常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交替使用。语篇的某些部分用交际翻译,其余部分用语义翻译。没有纯粹的交际翻译或纯粹的语义翻译,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并非完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一对二的对应关系,只不过其中一种策略常为某一类语篇的主要翻译策略。

关于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从时间上看,哲罗姆在古代就提出来了,到 20 世纪,莱斯和纽马克等人进一步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翻译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在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沿着玄奘的重写翻译思想进一步发展,如严复的信达雅说、郭沫若的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都具有重写的特征。

严复的信达雅说,鲁迅对其作了分析:“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罗新璋 1984:275)“最好

懂的自然就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ibid.: 274)这反映出严复译本遵循的是当时的文学艺术价值标准,因此具有中文诗学特征。其实,严复不仅从诗学特征上重写,而且从内容上也重写。例如,他翻译的《原富》单从篇幅上看,只有原文篇幅的一半。鲁迅本人也认为:“翻译应该根据中国翻译史上‘唐译佛经,元译上谕’的历史经验,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即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转引自王秉钦 2004: 121)这实际上就是翻译对原文内容的重写过程。郭沫若的“创作论”强调译文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实际上是对严复的“雅”的一种高度艺术概括。(ibid.: 153)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同样是视翻译为艺术创作:“……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罗新璋 1984: 430)林语堂这种对美的追求就是对目的语语文的诗学美的追求。同样,朱光潜强调翻译艺术论,而且他明确提出翻译应符合当时的诗学特征:“译文仍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习惯,……”(罗新璋 1984: 454)傅雷的“神似论”强调的也是用中文诗学特征去实现原文神韵的表达:“……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善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见罗新璋 1984: 559)钱钟书的“化境论”,也是强调用中文的诗学特征去重写原文文本:“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见罗新璋 1984: 696 - 697)他这段话强调的仍然是译本的语言要符合译入语的诗学特征。

5.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虽然玄奘和哲罗姆的宗教翻译地位很相似,但他们各自的翻译思想却不同。玄奘的翻译重写意识浓厚,而哲罗姆的翻译思想以廓清翻译策略与文本种类的对应关系著称。这些古代的翻译思想都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翻译思想的发展。

注释:

其他三位是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见马祖毅(1999: 102)。

其他三位权威神学家是 St. Ambrose, St. Augustine 和 Pope Gregory I, 见 Delisle & Woodsworth (1995: 169)。其他三位传统翻译理论家为 M. T. Sisero, M. Luther 和 J. W. Gothe。

李利安,中国宗教协会理事、长安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著有《金刚经译注》、《世亲传》、《白话法华经》、《真谛传》、《中国十大高

僧》等。

根据孙艺风,仲伟合(2004),text type 译成本种类, text typology 译成本类型。

关于哲罗姆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翻译思想,可参见 W. Wilss (1982:30); J. Munday (2001:21)。

参考文献:

- [1] Delisle, Jean & Judith Woodsworth. 1995.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2] Lefevere, André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3] Metzger, Bruce M. 2002. *The Bible in Translation* [M].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 [4] Munday, Jeremy.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 [5] Newmark, Peter.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Oxford and New York: Pergamon.
- [6] Reiss, Katharina. 1977.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C] Chesterman, A.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Helsinki: Finn Lectura, 1989.
- [7] Wilss, Wolfram. 1982.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Einheitssacht: Gunter Narr Verlag Tübingen.
- [8] 柏乐天. 1952. 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J]. 翻译通报 (5).
- [9] 陈琳. 2004. 论文本种类与翻译策略的关系的研究 [J]. 求索 (9).
- [10] 罗新璋. 1984. 翻译论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1] 马佩. 1997. 玄奘研究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 [12] 马祖毅. 1999. 中国翻译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3] 李利安. 1995. 《金刚经》玄奘译本析 [C] 黄心川. 玄奘研究文集.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 [14] 刘煦. 1975. 旧唐书·职官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5] 吕澄. 1953. 慈恩宗 [J]. 现代佛学 (9).
- [16] 任继愈. 1994.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7] 释道宣. 1926. 续高僧传·玄奘传 [M].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会.
- [18] 孙艺风, 仲伟合. 2004. 翻译研究关键词 [M]. (Jean Delisle et al.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9] 王秉钦. 2004.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20] 王运熙. 2002.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05 - 06 - 08

作者简介: 陈琳 (1965 →),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张春柏 (1951 →),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 杨晓荣)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Ren He Jiu”(A Person Drinks Wine) and “Jiu He Ren”(Wine Drinks a Person) —— A Minimalist Programme-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yntac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ome Chinese & English Verbs by YU Xiang-yue & LI Jie, p. 1

There are both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languages. In terms of generative grammar, the commonality is originated from the common initial state shared by human beings while 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the different parameters-selection made during their acquisition of languages. The present article, based on the Minimalist Programme, analyzes the lexicon features of English verb *drink* and Chinese verb “*he*” and explores why a similar concept is expressed syntac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That is to say, the so-called “containment construction” exists in Chinese but is rejected in English. A further study of the “containment construction” shows that the two-place transitive structure SVO is the foundation from which the construction in question is derived and that the switch of SVA into SVO provides the condition by which the intransitive verbs find the chance to enter the “containment construction”.

The Zero-Valence Verb in a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al Valence by ZHOU Tong-quan, p. 7

There has been some disagreement in the linguistic cycle over whether the type of verbs like “*xiayu* (rain)/ *xiaxue* (snow), *dalei* (thunder)” pertains to zero-valence word or one-valence word. Starting of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al valence,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abundant data from different languages to explore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expression of the word class. The conclusion from this exploration includes three aspects: 1) No zero-valence verbs exist in any language because there isn't any absolute motion that fails to depend on physical support; 2) The so-called “zero-valence phenomenon” in languages like English should better be viewed as the resulting product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an argument/valence into a verb; compared with the zero-valence words like “*come*, *go*, *sleep*”, this class of words bears a relatively weak proto-type status of one-valence verb membership.

How Chinese Thinking Works in English Reading: an Investigation through TAP and RI by WU Shi-yu & WANG Tong-shun, p. 41

Reading a foreign language text is no more considered as a monolingual event: while they are reading, L2 readers have access to their native language all the time. Owing to difficulties in observing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determine what role L1 plays in L2 reading. By investigating 21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t three level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through think-aloud protocols (TAP) and retrospective interviews (RI),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when they turn to their Chinese cognitive resources and how these cognitive activities help them comprehend an English tex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find some distinct patterns in their use of Chinese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which may be summarized as: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he readers' reliance on Chinese declines, but their use of Chinese is more supportive and eff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trategies used in identifying ideas and constructing meaning reduces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strategies used in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monitoring increa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ntalities on Transl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Xuan Zang and St. Jerome by CHEN Lin & ZHANG Chun-bai, p. 61

Xuan Zang and St. Jerome have much in common in their historical positions as both of them were successful pioneer translators of religious classics in their own cultures. However, they differ in their mentalities on translation. Xuan Zang'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rewriting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his Buddhist ideology as well as that of the poetics of his time. In contrast, St. Jerome cared more about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text typ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ch are basically dualist as he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and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The authors of this essay argu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mentalities, which still exists today.



知网查重限时 7折 最高可优惠 120元

本科定稿，硕博定稿，查重结果与学校一致

立即检测

免费论文查重：<http://www.paperyy.com>

3亿免费文献下载：<http://www.ixueshu.com>

超值论文自动降重：http://www.paperyy.com/reduce_repetition

PPT免费模版下载：<http://ppt.ixueshu.com>
